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主编/高介华

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文化

The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Jiangnan Watertown

周学鹰 马晓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文化

The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Jiangnan Watertown

周学鹰 马 晓/著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文化 / 周学鹰、马晓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 高介华主编)
ISBN 7-5351-4331-8

I . 中… II . ①周… ②马… III . 建筑艺术 - 研究 - 华东地区
IV . TU - 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1456号

责任编辑

杨唐轩

整体设计

夏金钟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027-83619605

邮编 430015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武汉市发展大道 32 号

开本： 889mm × 1230mm **1/16**

字数： 641 千字

印张： 27.75 **印张** 5 插页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书号： ISBN 7-5351-4331-8/T·19

定价： 190.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您调换)

绪 论

近年来，区域研究在众多学科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其最有成效者，首推考古学和文化史^[1]。

我国疆域广阔，历史悠久，自古存在着风格明显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关中）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因此，作为各地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各区域建筑，相应有鲜明的地域性。而我国自古及今存在的因地制宜的优良传统，又使得这种地域性越发彰显。

因多种原因，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原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喜的是，近些年来，有关各地丰富多彩的地域建筑论著，精彩纷呈。因此，研究江南水乡建筑文化，是为适时之举。

江南，可谓文化发达、经济富裕的代名词。她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更是人杰地灵。区域内宜人的气候环境，优美的自然山水，茂密的果树林木，点缀着古朴淡雅的宅园祠庙、亭桥楼阁等各类建筑，加之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江南水乡恍如人间仙境。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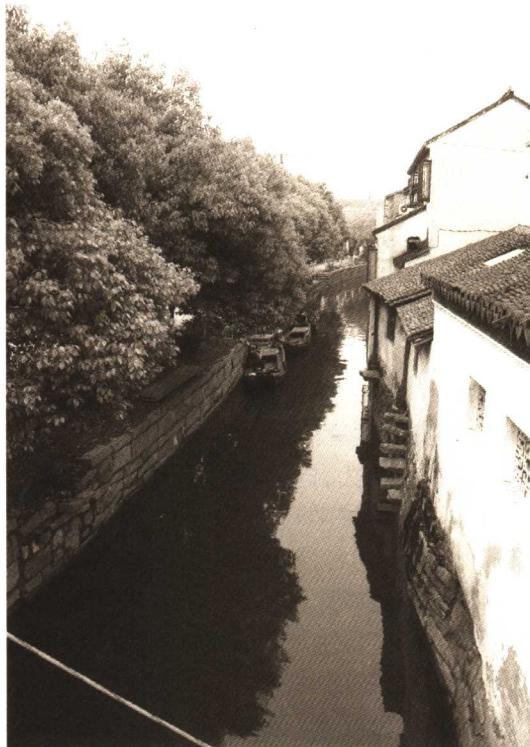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2]

唐白居易的《忆江南》小令，写尽了江南的山、水、人物，成为传诵千古的绝唱。（绪图1）

唐末，词人韦庄有一首《菩萨蛮》是这样描写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深切描写了江南水乡的风光美和人物美，表现了诗人欲去还留的依恋之情。

沈朝初在《忆江南》词中曾写到：“苏州好，载酒卷船船。几上博山香篆细，筵前冰碗五侯鲜，稳坐到山前。”描写了江南文化之一的船菜，独具水乡风味。历代文人骚客



绪图1 水乡甪直

有关江南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

南宋以后的江南水乡，更以其迅速发展的经济、丰厚的地域文化，成为了世人向往的“人间天堂”。

近年来，有关江南水乡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但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学者，也早已迎来越来越多的国外专家学者。在建筑学领域，依据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法，对江南水乡的各类型建筑，如民居、园林、桥梁、塔，或某种专门建筑，或园林中的厅堂、亭子等，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或针对水乡市镇、城市，甚至针对某一较大的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等，都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然而，从区域建筑文化发展的角度，对江南水乡的建筑文化进行专门探究，似乎还没有人进行过。毕竟，建筑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实体，它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

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经济环境、文化氛围，地域文化是地域建筑文化生长的丰厚的原始土壤。

区域建筑文化的研究，便是立足于地域文化的视野，深入了解地域建筑的区系风格特征，对我国古代建筑整体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区域进行思考，如此汇点成面，集腋成裘，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而加深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识。

地域建筑作为直接反映人与地域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种种作用力互动关系的物质载体，应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对于历史上地域环境明确、文化特色明显、风格特征鲜明的江南水乡建筑，进行整体的研究与考察，对其建筑文化特征的分布规律、现象，及其建筑风格成因与历史文化背景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历史之目的，不仅是了解过去，更在于关注未来。一般治史者，“通常所注重的，似乎是历史长河中那些活跃的、显而易见的东西……我相信，在将近二十年的对‘环境’事业的支持之后，那些绿色命题已经不再仅仅是自然界的状貌问题，也必须包括像对资源和能源的使用、贫富的分配、人们如何对待他人，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们所继承下来的这个世界等等这类核心问题”^[3]。江南水乡原有的建筑环境，似乎与此较为切合。（绪图2）

因此，本书立足于江南水乡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宏观背景之中，深入研究江南水乡社会与文化积淀的脉络，结合实地考察，研究江南水乡建筑所具有的地区系风格。进而探讨该地区建筑文化现象与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较为清晰、完整地说明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发展的脉络，借以说明建筑文化是与全部社会文化发展协调一致的文化现象，为本地域未来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点理论上的探讨，也对人类建筑与环境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点理性的思考。



绪图2 苏州光福
鸟瞰

一、江南水乡建筑文化研究对象

吴良镛先生等在《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一书研究中，“遵循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区域整体化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思想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合发展思想三条基本理论原则”，并进一步认为是“找到了解决区域整体协调发展问题的三大理论基础”^[4]。

上世纪美国建筑理论家和城市规划家芒福德(L.Mumford)，提出了区域整体性发展的观念。他深刻地指出：“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城市大大的扩大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来发展这些进程，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恩怨上的光辉，明彻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友谊，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5]

本书着重研究江南水乡建筑文化，从剖析地域文化出发，研究江南水乡这一特定地域环境中的特定建筑文化，对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并探讨其未来走向。

二、江南水乡建筑文化研究内容

自宋以降，江南水乡经济、文化越显发达，是近代中国最先遭遇现代化冲击的地区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孕育下，江南水乡建筑文化渐渐塑造成型。

吴良镛先生指出：“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推动了城市的大规模建设，也因

此造就了大量的建筑工匠,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参与。文人的意匠经营和工匠的制作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地区的城市在规划设计,风景名胜、园林、街巷、民居的构建,以及建筑的装修与陈设等方面,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节,都体现着江南建筑深邃的文化内涵。”^[6]

因之,本书欲从解剖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日常行为方式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江南水乡之空间特色及其形成与演变轨迹,品味江南水乡建筑形式与当地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说明“建筑是生活的建筑”、“建筑艺术是生活的艺术”这一永恒的真谛。并简略探讨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在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中,江南传统建筑与聚落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本书首先研究了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内容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人文等。

其次,在简述远古水乡聚落的基础上,对江南水乡地域范围内的乡村、市镇、城市等聚落形态,住宅(园林)、茶馆、会馆、会所、祠庙等各建筑文化类型,江南水乡建筑营造文化以及室内外建筑装修文化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最后,探讨江南水乡建筑文化未来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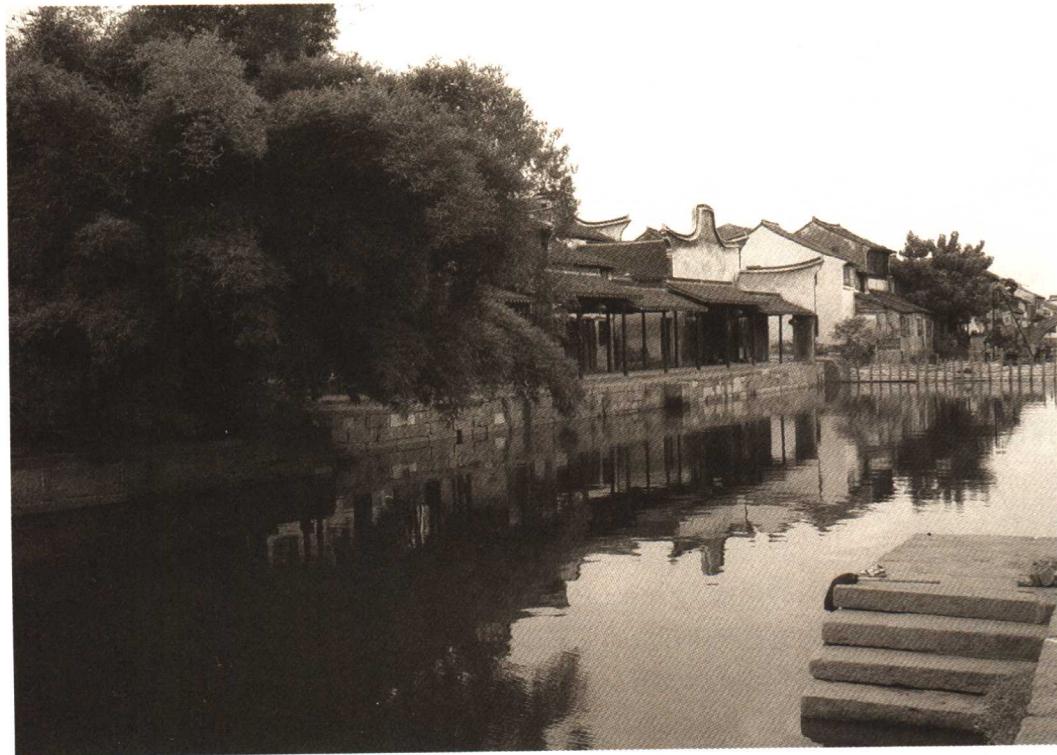
三、江南水乡建筑文化研究方法

因元之前的江南水乡建筑实物遗存较少,故宋元以前以文献典籍占优,辅以数量有限的各种建筑遗存。

建筑实物上,以明清时期为主。因之,本书对江南水乡建筑文化的研究着力于宋代之后,此为江南水乡现存建筑传统之主流。(绪图3)

诚如吴良镛先生言:“地理环境的沿革与人文、物质环境的变迁,作用于大自然,作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形成了特有的区域聚居环境,因此需要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来研

绪图3 水乡西塘



究区域的交通网络、区域的城镇网络、城乡一体化的城镇模式和开敞的空间系统,等等……因此,我们对地区建筑学的关心不仅在于它的文化传统的延续,更在于创造人工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城与乡相融合,园林、建筑、城市相融合的整体环境,在混沌中创造整体的协调美。”^[7]

[1] 李学勤:《丰富多彩的吴文化》,《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第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

[2] [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名编著:《白香山诗集》,武汉大学光盘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403卷第12册第49页。

[3]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前言)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4] 吴良镛等:《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前言)第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4月版。

[5] (美)芒福德(L.Mumford):《城市发展史》第42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6] 吴良镛:《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迎接新世纪的来临(1986~1995)》第17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9月版。

[7] 吴良镛等:《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前言)第1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4月版。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编纂委员会

顾问：吴良镛 齐 康

名誉主任顾问：杨鸿勋

主任委员：刘先觉 郭湖生 邱菊生 娄齐贵

副主任委员：吴庆洲 巫纪光 李先逵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志武 王 锋 王 冬 王鲁民 刘先觉

刘 塉 吴庆洲 巫纪光 余卓群 李先逵

张十庆 张先进 张万立 张敏龙 杨唐轩

杨秉德 杨慎初 沈福煦 郑振纨 姜传宗

柳 肃 娄齐贵 施维琳 郭湖生 顾孟潮

常 青 喻学才 戴志中 戴 俭

主编：高介华

总序(一)

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 良 镛

1 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1.1 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 1920—1930 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广义地看，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竞争力，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资源。有人说 21 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才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却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1.2 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阴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1.3 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1]。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2]。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3]，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

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2 “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2.1 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诸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了《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4]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5]，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了《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6]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7]一书，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像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也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该书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2.2 中国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8],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9]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10]

3 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11]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懈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12]、地域文化^[13]、地区建筑学^[14]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发展作一些新的探索。

(1) 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15]。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16]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7]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

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须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18]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真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 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收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乃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4 喜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与发行

从文化角度研究建筑，或从建筑论文化问题，应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一大进展，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提出(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自1989年在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召开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后开了6次会议，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二是1996年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高介华先生的努力下，组织“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计划出书30余种，蔚成系列，短短几年，已见成果，将在今年10月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先推出第一辑。我尚未读过书稿，但“文库”总目所列，正是涉及中国建筑文化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是值得加以研读的，也正是我个人渴望猎取的知识。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欣喜之余，聊书感怀，权代总序。